

华商网络对中国 *FDI* 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

蒙英华¹, 庄惠明²

(1.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2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 中国法律环境的不健全以及官方传递的信息有限均构成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不正式壁垒。而华商网络可以克服这一不正式壁垒从而对中国 *FDI* 的流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985-1999 年 *FDI* 母国与中国的华商网络关系密度每增加 1%, 将会促进流入中国的 *FDI* 增加 4.316%, 而且这一促进效应将会随着海外华商对祖国认同度的加强而逐渐增加。

关键词: 华商网络; 国际直接投资 (*FDI*); 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08)02-0037-06

引言

对于投资而言, 相关信息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 如劳动力和生产投入品的成本信息, 供应商与销售商等相关信息对于投资在将来是否获利非常关键; 除此之外, 在进行投资之前, 潜在的投资者也需要保证他的投资权利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他的供应商与顾客在将来都不会违反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 在法律环境不完善和官方信息有限的国家里, 投资的不正式壁垒是非常高的,^① 在这种环境之下, 如果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法律制度、语言、文化等情况不熟悉时, 他们就会碰到额外的困难。

从这个角度而言, 尽管目前中国正在逐步完善关于 *FDI* 方面的法律框架, 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地司法系统,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时不得不面对例如腐败、法律的不确定性、所有权保护等问题。中国似乎是一个对外国投资者存在大量不正式壁垒的国家。^② 根据 Wang 的表述:

法律条文的不明晰、相互矛盾, 缺乏透明度,

中国政府官员缺乏法律意识等都构成了在中国进行商业谈判与运作的障碍; 经常变化的政策与法律条文也构成了对商业合同的损害; 由于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与能力, 从而使商业纠纷很难得到公正的裁决。^③

但是, 在这种环境之下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却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活动。事实上, 当很多西方企业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碰到各种相对较难克服的困难时, 一些海外华人企业已经设法通过某种不正式的渠道把这种困难转变为他们的竞争优势, 例如通过个人的接触与血缘联系来达到与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和官员彼此认识并增进了解的目的, 从而可以迅速获得相关贸易和投资信息, 与此同时, 通过在华人企业家内部 (华商网络) 通过一种群体制裁的方式来抵制内部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来达到加强彼此间的契约执行力。

但华商之间的关系网络与建立在完善市场与法律机制基础上的西方商业相比, 在效率上存在着多大的优越性? 对于这个问题, 目前学术界还

收稿日期: 2007-09-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协调研究: 理论、证据与政策”的阶段性成果 (06JJD790030); 上海市重点学科资助研究项目 (第二期, P1601)

作者简介: 蒙英华 (1977-), 男, 广西苍梧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研究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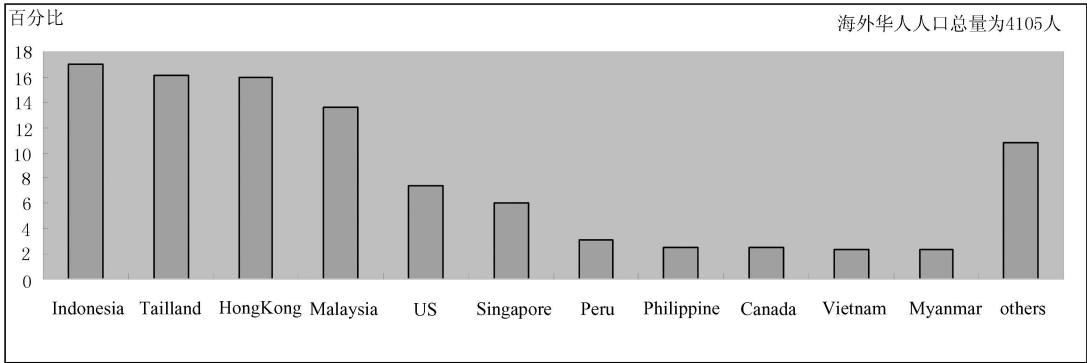
庄惠明 (1979-), 男, 福建泉州人,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系助教,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回答。为此, 本文主要是围绕华商网络是否会对中国引进 *FDI* 起到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及这种作用程度究竟有多大进行研究。文章安排如下: 首先,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海外华人的分布情况; 其次, 对族群网络 (华商网络) 促进国际直接投资作用的文献进行回顾; 第三, 对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 数据来源作出说明; 第四, 对华商网络促进中国的 *FDI* 效应进行经验分析; 最后得出文章的结论。

一、海外华人的分布情况

华人广泛地分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据估

计,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大概就有超过 4000 万的华人分布在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 76 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香港和澳门)。其中有大约 78% 分布在亚洲, 17% 分布在美洲, 其他分布在欧洲、非洲以及大洋洲等地区。而分布在亚洲的海外华人里面, 有 70%, 约 1900 万人主要分布在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三个国家; 另外, 海外华人在香港和新加坡占当地人口比例最高, 其比例分别达到 98% 和 76%。



图一 1999 年底海外各国 (地区) 华人人口占海外总华人总量比例排名情况

资料来源: <http://www.chinaqw.com.cn/node2/node116/node119/node158/index.htm> 台湾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统计数据。

海外华人的广泛分布给华商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为了取得经济利益, 他们会利用家庭、血缘以及其他关系进行相互联系并加深了解。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这些国家里, 华商企业占据了当地私营部门经济的 70% 左右。^④ 他们之间的商业交易, 从融资到定购经常都是通过个人之间的接触或者朋友的介绍基础上进行的。而且通过广泛分布在各地的大量华人社团, 更进一步加深了华商彼此间的联系。Li 用详尽的事实介绍了在过去几十年间海外华商网络发展的全球化趋势。^⑤ 例如,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起由海外华人社团举办的世界性会议就大约有 100 多个, 其中一些社团还受到了著名华商领袖的经济支持和当地社区的政治支持。此外, 还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一些华人社团期望将其成员与家乡建立起联系作为社团的主要目的。因此, 这些社团经常会组织一些贸易与投资洽谈会, 邀请中国大陆家乡的代表团参加, 希望可以借此提供一些在中国大陆的贸易与投资机会。除了上述发挥信息交换、提供商业信息的功

能外, Li 指出, 通过形成一套与中国文化价值相符的行为标准, 这些社团在促进有益于商业信任社会价值理念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它为鼓励商业信任提供了一套第三方制裁的机制。

正如前面所述, 通过华商之间不正式的个人交往以及正式的海外华人社团, 华商网络内部的信息共享以及其商业信任机制的建立对于海外华商向中国大陆进行直接投资可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族群网络促进国际直接投资作用的文献回顾

(一) 基本理论研究

在国际贸易范畴中, 社会网络指国际间涵盖各种社会关系的族群网络 (co-ethnic network) 和商业集团 (business group)。Rauch 认为, 族群网络是指在民族、地区方面具有人口统计意义的个人或企业团体, 其典型代表便是举世闻名的华商网络;^⑥ Granovetter 认为, 商业集团则是“既不完全整合, 又非毫无整合的一组厂商”, 其成员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家族企业, 其典型代表包括日本的综

合商社 (Keiretsu) 和韩国的大型贸易公司 (Chaebol) 等。^⑦作为一种社会网络, 族群网络是一种可以降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与代理成本, 从而克服贸易与投资中不正式贸易壁垒的非市场机制。

通过对 11 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从事贸易的 Maghribi 商人进行研究后, Greif 发现, 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地区, 通过在社区内部实施一种对违背契约的机会主义者制裁的方法, 族群网络可以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生。^{⑧⑨}此外, Gould 和 Rauch and Cassella 从族群网络可以给交易双方提供匹配信息和相关服务作用的角度, 强调了族群网络可以明显地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 最终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行为的发生。^{⑩⑪}

通过以上两种机制, 族群网络都可期望促进贸易与投资行为的发生, 但当市场制度, 尤其是法律机制完善的时候, 族群网络在促进贸易与投资上的作用预期将会减小。

(二) 早期经验研究

族群网络在克服不正式壁垒以促进贸易与投资行为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而其中又以海外华商网络为研究的热点, 这份是因为它规模巨大及其促进效应的显著性,^⑫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对华商网络的经验研究可以分成两个分支, 描述性的与经济计量的。由于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不久, 因此目前在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

1. 描述性的事实

通过使用 1994、1995、1998 年的访谈记录, Wang 证实了华商之间的个人关系如何促进 FDI 流入中国。文章表明, 由于海外华商在文化与组织制度上的优越性, 以及他们通过利用与中国大陆存在的亲缘关系等, 从而使得他们可以有效地利用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去有效保护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利益。^⑬此外, 她还表明:

海外华商充当着连接中国大陆与世界的桥梁。因为他们为外国投资商理解与使用人际关系网络去促进对中国的投资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没有海外华商作为代理的话, 外国公司如果要使用人际关系去弥补中国法律制度不完善的缺陷就相对比较困难了。^⑭

相类似的, Weidenbaum and Hughes Hamilton 指出, 在中国较弱的法律机制环境之下, 对于海外华商而言, 华商网络的存在相对于外国投资者而

言具备了一种比较优势。^⑮

2 经济计量研究

目前有三篇文章与这个主题相关。Fu 通过使用流入中国 29 个省份 FDI 的数据分成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1979 到 1984、1985 到 1990、1991 到 1996)。他发现离广东、上海、福建三个省份越远, 那么华商网络的作用也就越低, 而广东、上海、福建三个省份历来是迁移到海外生活华人最多的地区。此外, 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华商网络对 FDI 流入中国所起的促进作用变得越来越小。^⑯

Gao 认为, 华商网络对于 FDI 流入中国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通过使用 1984–1997 年 68 个国家投向中国的 FDI、各国华人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等相应数据用截面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后, 他发现无论是对于水平型 FDI 或者是垂直型 FDI 而言, 海外华人占当地总人口比例每上升 1% 都会导致流入中国的 FDI 上升 3.8%。在文章中, 尽管他认为流入中国的 FDI 存量要比 FDI 流量更好地代表了外国公司的行为, 但同时他也使用了 1994–1997 年 FDI 的流量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发现 FDI 母国每增加 1% 的当地华人人口, 就会分别提高流入中国 FDI 额 4% (1995 年) 和 7.4% (1996 年)。^⑰ 本文将在 Gao 的研究基础上, 通过使用 1985–1999 年共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应数据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扩大研究时间幅度与改变回归方法, 探求分析结果是否会发生变化。

Sarah Y. Tong 发现, 华商网络不仅仅只对经济水平较低、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产生影响; 对于官僚主义较浓的国家而言, 华商网络也显示出其对 FDI 流入的促进作用, 而且, 其相关系数要比官僚主义较低的国家还要大。他认为, 对于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而言, 华商网络提供了一种防止欺骗行为发生的制裁机制, 这对于解释华商网络促进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效力; 而对于制度较完善的东道国而言, 华商网络主要功能是帮助投资者跨越投资决策的信息壁垒; 而且, 对于引资行为来说, 提供信息的机制似乎要比制裁欺骗的机制更显重要。^⑱

三、研究方法 & 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决定 FDI 发生的各种模型里 (包括跨国公司垂直型生产、水平型生产以及知识资本模型), 国家的各种特征决定着 FDI 的发生与跨国公司的

行为, 如: 母国与东道国经济总规模的大小, 贸易成本, 相对资源禀赋, 相对熟练劳动力禀赋, 每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等因素。其中各种决定因素与相应模型中的预测符号见表 1。

表 1: 决定跨国公司行为的因素与各种理论预测的符号

变量	垂直型生产	水平型生产	知识资本
东道国与母国 GDP 之和	0	+	+
两国 GDP 差额的绝对值	0	-	-
两国人均 GDP 差额的绝对值	+	-	-
两国人均资本差额的绝对值	+	-	?
两国相对技能禀赋差额的绝对值	+	?	+
两国之间的距离	?	?	?

资料来源: Carr David L., James R. Markusen, and Keith E. Maskus(1998), 但交叉乘积项在上表中删去。在表 1 中, 0 代表不影响, + 代表存在正相关关系, - 代表存在负相关关系, ? 代表不确定。

为了分析的需要, 在这里所用的回归模型主要参照 Gary Markusen 的知识资本模型以及 Carr Markusen and Maskus 的经验研究模型修改而来。^{⑩⑪⑫}但由于中国熟练劳动力数据的匮乏, 因此, 我们用两国人均 差额变量来替代 Carr Markusen and Maskus 模型中的两国相对熟练劳动力禀赋差额变量。^⑬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begin{aligned} \log(FDI_{ijt}) = & \beta_0 + \beta_1 \times \log(GDP_{it} + GDP_{jt}) + \\ & \beta_2 \times \log(GDP_{it} - GDP_{jt})^2 + \beta_3 \times \log(PCGDP_{it} - \\ & PCGDP_{jt}) + \beta_4 \times \log(Distance_{ij}) + \beta_5 \times (Network_{i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FDI 是指各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 i 和 j 分别代表 FDI 来源国与中国, t 代表时间。第一个自变量用 FDI 来源国与中国 GDP 的和来代表两国共同经济规模的大小, 在水平型跨国生产理论里, 两国经济规模越大对跨国生产起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因此方程回归系数 β_1 期望为正数; 第二个自变量为两国 GDP 差额的平方, 在水平型跨国生产理论里, 如果两国越相似, 那么两国间的 FDI 额也就越大。换句话说, 如果东道国与母国的经济规模差异越大, 那么两国间的跨国生产行为规模也就越小, 因此方程回归系数 β_2 期望为负数; 第三个自变量为东道国与中国人均 GDP 的差额, 由于垂直型跨国生产与水平型跨国生产理论解释的冲突, 方程回归系数 β_3 的符号不能确定; 第四个变量为各 FDI 母国首都与中国上海市的距离, 由于垂直型跨国生产与水平型跨国生产理论解释的冲突, 方程回归系数 的符号也是不能确定的。

而关于社会网络对跨国公司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与邓宁 (J.H. Dun-

ning) 关于解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 OLI 模式不一样, 社会网络理论的重点不是研究环境的约束而是研究社会网络中成员的行为及其相互影响, 这种观点认为, 关系网络可以促进企业间联盟的形成, 促进信息共享、知识共享和价值创造, 从更广泛地意义上讲, 所有的组织都必须建立网络联系或关联来获得资源、产品和服务。事实上, 当今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进一步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 网络化已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重要特征, 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非股权或契约安排结成的全球网络型的战略联盟, 正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所拥有的一种新的竞争优势。

对于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海外华商而言,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 他们与中国大陆都会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的存在使得海外华商具备了其他国家企业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如海外华商可以利用他们在中国投资地的联系, 克服由于中国大陆法律环境不健全从而对投资造成的伤害。因而, 这种网络联系最终成为促使海外华商往中国大陆进行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回归方程 (1) 的设定中, 最后一个变量 $Network_{it}$ 用来测量分布在各 FDI 母国的华商与中国华商之间网络关系的大小, 由于在现实中这个数据非常难获得, 因此这里我们沿用 Rauch and Trindade 对这一指标的替代计算方法, 即用第 t 年居住在 i 国的华人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与当年中国华人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乘积来进行测度, 乘积越大, 表示两地华商的关系密度也就越密切。^⑭预计两国华商网络关系越密切, 那么对中国的 FDI 数额也就越大, 方程回归系数 β_5 的符号

期望为正数。

(二)数据说明

鉴于各国华人人口统计数据与各投资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 1985 1990 1994 1999 共四年的数据,其中选取的样本为: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香港、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丹麦、比利时、瑞典、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共 21 个国家(地区)。

其中 1990 年华人统计数据来源于 Rauch 和 Trindade 1985 年华人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华侨经济年鉴》(1985 1986 年);^⑤ 1994 年华人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黄润龙;^⑥ 1999 年华人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台湾省对海外华人华侨的统计数据。^⑦ 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各国人口、GDP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网站。国家间的距离来自 www. indo. com 网站中的“距离计算器”。

(三)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形式的确定

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分为变截距、变系数和相同截距与系数三种模型。

$$y_{it} = \alpha_i + \beta_i'x_{it} + \mu_{it}$$

其中 α_i 与 β_i' 都是个体时期的恒量,其取值只受到截面单元不同的影响。在参数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下,截距和斜率参数又可以有如下两种假设:

H 01: 回归斜率系数相同,但截距不同,即有 $\beta_1 = \beta_2 \dots \dots \beta_n$ 模型为:

$$y_{it} = \alpha_i + \beta'x_{it} + \mu_{it}$$

H 02 回归斜率系数和截距都相同,即有 $\beta_1 = \beta_2 \dots \dots \beta_n, \alpha_1 = \alpha_2 \dots \dots \alpha_n$ 模型为:

$$y_{it} = \alpha + \beta'x_{it} + \mu_{it}$$

判断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模型,我们可以用 H a u s m a n 检验来进行判断:

H 0 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H 1: 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先使用随机效应回归,然后做 H a u s m a n 检验,如果是小概率事件,拒绝原假设则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应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四、华商网络促进中国 FDI 效应的经验分析

按上所述,我们首先运用 E v i e w s 5. 1 运用面板数据方程 (1) 进行 H a u s m a n 检验:

表 2 对方程 (1) 进行 H a u s m a n 检验的结果

Test Summ ary	Chi- Sq Statistic	Chi- Sq d f	Prob
Cross- section random	7. 881036	4	0. 0960

通过对模型分析可知, H a u s m a n s 检验值 $Chi - Sq(4) = 7. 881036$ 我们对方程 (1) 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3 中的 1. 1。此外,为了得到华商网络在不同时期对 FDI 流入中国效应的变化,我们分别用 1985 1990 1994 前三年的数据与 1990 1994 1999 后三年的数据再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分别见表 3 中的 1. 2 与 1. 3。

表 3 华商网络促进 FDI 流入中国效应的经验分析

变量 / 回归结果	(1. 1)	(1. 2)	(1. 3)
截面系数: β_0	- 18. 358* * *	- 15. 529* * *	- 17. 261* * *
	(5. 138)	(6. 215)	(5. 783)
$Log (GDP_{it} + GDP_{jt}): \beta_1$	2. 614* * *	2. 488* * *	2. 487* * *
	(0. 382)	(0. 455)	(0. 415)
$Log (GDP_{it} + GDP_{jt})^2: \beta_2$	- 0. 067	- 0. 09	- 0. 020
	(0. 109)	(0. 124)	(0. 106)
$Log (PCGDP_{it} + PCGDP_{jt}): \beta_3$	0. 392* * *	0. 406*	0. 356*
	(0. 189)	(0. 224)	(0. 207)
$Log (D istance_{ij}): \beta_4$	- 1. 336* * *	- 1. 430* * *	- 1. 355* * *
	(0. 423)	(0. 504)	(0. 469)
$(netw ork_{it}): \beta_5$	4. 316* * *	4. 191* * *	4. 478* * *
	(1. 113)	(1. 292)	(1. 264)
调整后的 R^2	0. 671	0. 630	0. 601
DW 值	1. 949	2. 226	1. 919
观察值	83	63	62

注: * * * 代表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 * * 代表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 括号为标准差。

从表 3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除了 $\text{Log}(GDP_{it} - GDP_{jt})^2$ 变量没有通过检验以外,其余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期望结果一样,两国 GDP 之和和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表明从 1985 年到 1999 年,两国 GDP 总和每上升 1%,将会导致流入中国的 FDI 增加 2.614%;按理论分析,两国 GDP 差额的平方应与流入的 FDI 成负相关关系,但在此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变量并没有通过检验,因此并没有得到两国 GDP 越相近对 FDI 流入的促进作用就越大的结论;与水平型跨国生产理论所预测的相反,两国人均 GDP 的差额与流入的 FDI 成正比例关系,因此回归结果与垂直型 FDI 的理论所预测的结果一致:投资国与中国人均 GDP 的差额每增加 1% 将会导致中国流入的 FDI 增加 0.392%;在距离变量的回归结果中,距离变量与流入中国的 FDI 成反比例关系。

对于我们所关注的变量——华商网络变量与流入中国的 FDI 成正比例关系,而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1985—1999 年 FDI 母国与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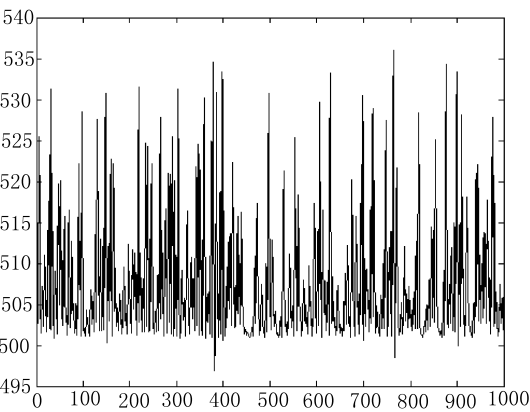
华商网络关系密度每增加 1%,将会导致流入中国的 FDI 增加 4.316%。但在这里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比 Gao Dorothe Singer 得到的结果稍小,^④ 原因是我们在这里使用面板数据方法使用了多个年份的各国当地华人数据进行回归,而他们的研究只使用 1990 年的数据用截面方法进行回归。^⑤

而且,我们从 1.2 和 1.3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商网络对 FDI 流入中国的促进效应会逐渐加强,从 4.191% 上升到 4.478%。这其中是因为随着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后中国对引进外资政策的转变,各省份不断派出代表团到各国吸引外资,而且在这段时间内海外华商对祖国的认同度有所上升,对家乡经济发展的愿望与责任也有所加强。本文的回归结果与 Dorothe Singer 的回归结果是相类似的,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并没有进行到足以产生替代作用的程度,回归系数的提高只是表明数值在中值附近的波动,并不是真正反映了替代作用。

注释:

- ① 通常,不正式壁垒泛指除关税外的贸易(投资)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而在本文中,不正式壁垒指贸易(投资)合同执行不力、贸易(投资)机会信息不充分等方面。
- ② Bulcke, Daniel Van Der, Haiyan Zhang, and Maria do Ceu Esteves, *European Unio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Characteristic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3.
- ③④ Wang Hongying, *Weak State Strong Networks: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Oxford, UK an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④ Weidenbaum, Murray and Samuel Hughes, *The Bamboo Networks*. Martin Kessler Books,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96.
- ⑤ Liu Hong,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Yeung Henry Wai-chung and Kris Olds (ed.),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Firm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0.
- ⑥ Rauch, James E. "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9 (December 2001), pp. 1177–1203.
- ⑦ Granovetter, Mark. "Coase Revisited: Business Groups in the Modern Economy",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 4, no. 1 (1995), pp. 93–129.
- ⑧ Greif, Avner. "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 in Medieval Trade: Evidence on the Maghribi Trader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4 (1989), pp. 857–882.
- ⑨ Greif, Avner.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hribi Traders'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3 (1993), pp. 525–548.
- ⑩ Gould, David. "Immigrant Links to the Home Country: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U. S. Bilateral Trade Flow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72, no. 2 (1994), pp. 302–316.
- ⑪ Rauch, James and Alessandra Casella. *Overcoming Informational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Prices and Group Ties*. NBER Working Paper, 1998, p. 6628.
- ⑫ Rauch, James E. and Victor Trinidad.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84, no. 1 (2002), pp. 116–130.
- ⑬ Wang (2001) 指出,外国人也同样可以使用关系网络,但与华人相比,他们使用关系网络的有效性不如华人,因此他们趋于劣势。

(下转第 46 页)



图一 模拟风险资产的价格运动

形式为:

$$\ln P(t) = \gamma \ln P(t-1) + u_t$$

注释:

- ① Jean Tirole “On the possibility of speculation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Econometrica* Vol 50, No 5 (1982), pp 1163 – 1182
- ② 李双成、张宏伟、赵长城:《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与信息流关系的实证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 ③ 唐齐鸣、陈健:《中国股市的 ARCH 效应分析》,《世界经济》2001年第3期。
- ④ Brock, W. A. & Hommes C. H., “Heterogeneous beliefs and routes to chaos in a simple asset pricing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Vol 22, no 8–9(1998), pp 1235–1274

[责任编辑:黄艳林]

(上接第 42 页)

- ⑮ Hanilton Gary G, *The Organization Foundations of Western and Chinese Commerce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Gary G. Hanilton (ed), *Asia Business Networks*,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and New York, 1996
- ⑯ Fu, Jun, *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 ⑰ Gao Ting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4, no 4(2003), pp 611–629.
- ⑱ Sarah Y. Tong “Ethnic Networks in FDI and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 no 4(2003), 563–580.
- ⑲ Markusen, James R, *Trade versus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1997 p 6231.
- ⑳ Markusen, James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UK: MIT Press, 2002
- ㉑ Carr, David, James Markusen, and Keith Maskus “Estimating the Knowledge-Capital Model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3(2001), pp 693–708.
- ㉒ 两国人均 GDP 的差额更好地反映了两国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与两国市场规模的大小,具体见 Gao(2003)。
- ㉓ 根据历年的数据估算,在这里假定中国人占中国全人口的比例为 0.97。
- ㉔ 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华侨经济年鉴》,台北:世界华商贸易会议,1985年,1986年。
- ㉕ 黄润龙:《海外移民和美籍华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 ㉖ <http://www.chinaqw.com.cn/node2/node116/node119/node158/index.html>
- ㉗ Dorothe Singer *The Role of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China's FDI Inflows* http://digitalcommons.mcalester.edu/economics_honors_projects/2 2006
- ㉘ Gao(2003)通过用不同的方程进行回归,弹性系数至少为 3.8% 以上。Dorothe Singer(2006)的估计结果为,在 1984 到 1991 年间的弹性系数为 4.6 1992–2003 年的弹性系数为 5.5%。

[责任编辑:黄艳林]